

论威廉·吉尔的 康区行及其代表作《金沙江》

向 玉 成

(四川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成都 610064; 乐山师范学院 四川旅游发展研究中心, 四川 乐山 614000)

摘要:威廉·吉尔可谓近代西方主动且成功穿越康区的第一人。他在康区的游历考察活动,较深入地了解了康区的基本情况,取得了多方面成就,正式揭开了国际康区研究的序幕,对近代西方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的代表作《金沙江》一书,系近代西方学者最早从学术史的角度论述入康外国人活动的著作,虽有其局限性,但因史料异常丰富,成为近代前期外国人认识康区的“百科全书”,在他之后入康的许多外国人及其著述都以此书为主臬。

关键词:威廉·吉尔;穿越康区第一人;《金沙江》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2)05-0084-09

自中世纪以来,西方人就对穿越康区进入神秘的藏区充满了强烈的渴望。鸦片战争后,一直期待进入康藏地区的西方传教士和探险家,开始涌入康区开展考察和探险活动,试图揭开笼罩在这片土地上的神秘面纱。但 1876 年中英《烟台条约》签订之前,外国人进入康区虽然没有明确被视为非法活动,却遭到了当地僧俗人士的强烈抵制,外国人尤其是多批法国传教士取道康区深入藏区以至于拉萨的企图更是均以失败告终。1845—1846 年,擅自潜入藏区的法国传教士古伯察(Evariste-Regis Huc.)和秦噶啐(Joseph Gabet)被押解出藏区,系“被动穿越”;1868 年,英国人库柏(T. T. Cooper)穿越康区,从打箭炉(Ta-Chien-Lu,即康定)经巴塘到达维西后被“阻回”,穿越活动并未成功^{[1]355-385}。1877 年,与威廉·吉尔从上海同行到重庆的英国首任“驻寓”重庆商务代表贝得禄^①于当年 7 月 8 日从重庆出发^{[2]5},晚吉尔一个半月入凉山和打箭炉等地^{[3]1-2};英国内

地会传教士康慕伦(James Cameron)于同年 8 月抵达打箭炉,后经理塘、巴塘进入云南和缅甸,比吉尔晚两个月入康区^{[4]1}。故 1877 年成功穿越康区的英国人威廉·吉尔,实乃近代西方主动且成功穿越康区的第一人。

1877 年夏,威廉·吉尔溯长江而上,经成都、松潘^②、雅州(雅安)、打箭炉、巴塘、阿墩子(今云南德钦)、东竹林寺^③、沙鲁^④、巨甸、石鼓、剑川、大理到缅甸,于 1880 年出版了《金沙江:穿越中国内地和藏东至缅甸之旅纪事》一书,1883 年即再版^⑤。但目前西方学术界尚未见研究吉尔及该书的专著。清代官方文献如《德宗实录》、《清季外交史料》等对吉尔的活动有记载,民国相关著述主要见徐尔灏《青康藏新西人考察史略》。迄今国内尚无直接研究吉尔及该书的专论,仅房建昌、杜永彬、泽拥等学者在其相关论文和隗瀛涛、冯明珠、王川、赵艾东等学者在相关综合性研究论著中有所涉及^⑥。由于无中译本,该书

收稿日期:2012-01-18

基金项目:本文系 2011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近代外国人在康区游历考察研究”(编号:11XZS01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向玉成(1969—),男,四川南部人,乐山师范学院教授,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区域经济与社会史研究。

内容尚不为国内学术界了解。本文拟对威廉·吉尔生平、康区之行及其代表作《金沙江》一书作一探讨。

一 威廉·吉尔生平及主要成就

威廉·吉尔(William John Gill, 1843—1882), 清代官方文档译为“吉为哩”, 徐尔灏又译“祈尔”, 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 探险旅行家, 1843年生于印度班加罗尔(Bangalore)。吉尔性情淳朴坚韧, 曾就读于布莱顿学院, 后进入皇家军事学院并于1864年完成皇家工程师学业。1869年9月回到印度, 行前得到了其母亲的一位远房亲戚遗赠的一大笔财产, 为其从事向往之探险事业奠定了经济基础。1873年4月至年底参加巴克上校(Colonel V. Baker)的探险队到波斯考察, 以及1876年出版的关于此行的报道《东方的云雾》, 使他成为有名的探险旅行家^{[5]19-22}。吉尔于1876年9月8日乘船到上海, 随后去直隶、天津、北京, 游览了天坛、长城、承德等地, 后返回上海。1877年溯长江而上, 穿越四川、康区、云南至英属缅甸的探险游历, 及其代表作《金沙江: 穿越中国内地和藏东至缅甸之旅纪事》的出版, 使吉尔的事业达到了巅峰, 他因此成为西方著名的探险旅行家。1878年春, 吉尔到君士坦丁堡参与俄土边界测绘工作, 后又到印度、巴基斯坦、中亚、英国、马耳他、的黎波里、土耳其、利比亚、伦敦、黎巴嫩等地游历考察。1882年, 吉尔在埃及被杀。

吉尔的代表作《金沙江: 穿越中国内地和藏东至缅甸之旅纪事》, 国内学术界一般简称为《金沙江》。关于该书版本及内容, 下文详论。吉尔还著有5万余字的长文《华西和藏东边区之旅》, 1878年发表于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刊《地理学刊》^[6]; 该文缩写本发表于“*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London*”, 篇幅近万字^[7]。二文基本上是《金沙江》一书内容的缩写。笔者以为, 文中W. J. Turner根据吉尔沿途所绘考察线路图, 并参照贝得禄和长期在巴塘传教的法国传教士德什各丁斯^②等人考察绘制的地图“Route Map of Captain W. J. Gill's Journey in Western China and Eastern Tibet”, 极有价值。图中详细标注沿途城镇、重要村落、居民点和山河、关隘地名, 对于我们研究19世纪70年代中国西南地区尤其是长江流域大量不为人知的地理、社会状况, 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作用。

此外, 吉尔与查尔斯·布莱克(Charles E. D. Black)合写有《萨尔温江上游; 或曰怒子江》一文^[8]。

该文系查尔斯·布莱克因怀疑班智达南·辛格和俄国著名探险家普热瓦斯基认为那曲卡(Nak-chuka)^③乃怒江(Lu-Chian, 或称“怒子江”Lu-tz-Chian, 即萨尔温江 Salwen)上源的说法, 邀请吉尔一起讨论该问题而写成的。查尔斯·布莱克通过研究分析吉尔关于康区地理的记载, 指出班智达南·辛格和普热瓦斯基认为的那曲卡乃怒江上源的看法系一大错误。吉尔亦认为, 班智达南·辛格非常肯定地认为吉曲(Di-Chu, 即澜沧江西源, 在昌都与东源扎曲汇流成为澜沧江——笔者注)系金沙江(Chin-Sha-Chian)上源的说法证据不足, 因为他本人经考察发现在吉曲西面还有两条水量很大的河流。同时, 该文指出, 既然班智达南·辛格承认扎曲(Sha-Chu)和那曲卡都流到察木多(Chiamdo, 即昌都), 那么二者就都应是澜沧江(Lan-Ts'ang-Chian, 即湄公河 Mekong, 金敦·沃德的文著中又常写为 Menkong——笔者注)的支流, 因为现在已经弄清楚, 澜沧江流经察木多; 所以, 现有的考察材料证实, 很明显, 班智达南·辛格错了, 因为其关于那曲卡究竟是怒江还是澜沧江的说法自相矛盾。吉尔还指出, 在这个问题上, 楚特(Henry Trotter)也犯了明显的错误: 他根据班智达南·辛格的记载, 认为吉曲是雅砻江(Ya-Lung-Chian)上源, 接着又说其东面的达曲(Jha-Chu, 即鲜水河, 雅砻江支流, 在雅江附近汇入雅砻江——笔者注)就是扬子江(Yang-Tzu, 又名金沙江 Chin-Sha-Chian), 这就完全让人“如坠五里雾中”(吉尔语)。吉尔之考察证明, 雅砻江水系本在扬子江东面, 因为他本人在河口(Ho-K'ou, 即雅江)亲自跨越过这条河流^④; 达曲如果更靠东面, 那它就只可能属雅砻江而非扬子江水系。吉尔在文中还认为当年古伯察从拉萨到察木多和打箭炉沿途对水系的记载并不专业, 也欠细致, 如古伯察记载从拉萨到打箭炉途中只有金沙江这一条大河。查尔斯·布莱克也承认, 康区河流水系复杂, 要搞清楚绝非易事。为了“驱散”古伯察、班智达南·辛格诸人之记载给西方地理学界带来的“一头雾水”, 查尔斯·布莱克甚至提出, 或许“察木多”不止一个, 有可能很多地方都名叫“察木多”, 即古伯察所述“察木多”和其他人所记并非同一地点。笔者以为, 这显然是查尔斯·布莱克“和稀泥”的论调。

众所周知, 弄清楚康区的河流水系关系乃近代西方地理学界尤其是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一个重大

学术目标,也是近代西方列强的一大政治目标,为此他们花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吉尔康区之行考察所得材料,其价值不言而喻。

为了表彰吉尔穿越康区的开创之功及其考察成就,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和巴黎地理学会分别于1879年、1880年授予其金质奖章,表彰他:“两次自愿探险旅行中所作的令人敬佩的地理工作,即1873年沿波斯北部边疆,1877年在尚未探险的华西和西藏地区,尤其是在后一地区所作的一系列认真仔细的高度观测和横断面测量,使我们第一次能够对那些未知的高山地带用相当的准确性建立横断面。另外还有他交给学会刊物的有关自己考察过程的回忆,以及有关他的旅程的42张一英寸代表两英里的地图。”^{[5]29-30}从中大致可窥见吉尔的考察成果及其在皇家地理学会等西方学术机构的影响。

二 威廉·吉尔穿越康区的行程与收获

1875年“马嘉里事件”发生后,中英于次年订立《烟台条约》,其“另议专条”规定了英国从1877年起可以派员由中国内地入藏至印度或由印度入藏“探路”的权利,护照由总理衙门“察酌情形,妥为办给”。由此英国人获得了由川滇入藏区之“条约权利”。吉尔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进入康区的。

吉尔为此行作了充分准备。1876年5月来中国之前,他在印度拜访了贝得禄,经贝氏建议,他又拜访了当时在印度的库柏,并手持亨利·玉尔上校^①的介绍信专程前往柏林拜访当时关于中国问题的“头号权威”李希霍芬,向他们请教关于中国西部的情况^{[5]1}。从上海出发前,吉尔雇了翻译Chin-Tai及其朋友Chung-Erh作跟班。经贝得禄建议,吉尔由Chin-Tai协助精心准备了大量后勤物资,共12大箱(每箱重180磅,分成两份以备途中有变)。其中行李塞满了六箱:包括1箱茶、4箱火柴、6只2盎司大的蒸馏锅、2袋马赛压缩干菜、1瓶英国伍斯特调味沙司、1箱雪茄、1箱牙粉、1盒牙签、1小瓶辣椒粉;另外还有六箱:1箱盐、1箱芥末、6只2盎司大的蒸馏锅、1箱雪茄、1袋马赛熟干菜、4箱火柴、4块清洁肥皂、1块黄肥皂、1块石碳酸肥皂、1小箱名牌糖肉^{[5]42-43}。从成都出发入藏时,吉尔为此行准备的经费为白银3000两^{[5]145}。

1877年2月,吉尔从上海同贝得禄同行,雇中国船到重庆。在重庆时得到法国天主教肖沃主教^②

从打箭炉传来消息说,华西和藏区的喇嘛们鉴于人们群起反对英国和俄国教会人士进入,他们将在边区集结武力阻挡外国人进入,原因有二:一是由于英国在印度的权力扩张,他们担心哪怕放一个外国人进入,则会导致失去藏区;二是由于宗教考虑,担心他们失去其宗教以及相应的权力。但吉尔认为,反对完全来自中国官方,只不过他们试图显示出是喇嘛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影响驱使藏人排斥外国人^{[5]86-87}。

吉尔由重庆走陆路经荣昌、自流井(自贡)到成都。1877年5月18日,吉尔从成都出发深入到从前欧洲人从未去过的川西北地区,“查看道路形势,探明风土人情”,随行的除轿夫外,还有8个行李苦力和4个听差(他们是地方官为其配备的保卫),经郫县、灌县(都江堰)、兴文坪、汶川、理番府、茂州,到达此前“没有欧洲人,包括传教士曾到过”的松潘厅,随后经蜂桶关(今宝兴县境内)、龙安府(今四川平武)、绵州(今绵阳)回到成都,与从中国贵州赶来的英国人麦士尼^③在成都会合。吉尔原计划从甘肃到新疆喀什噶尔(Kashgar)及中亚,但由于英俄战争,难以穿越俄罗斯,遂决定取道巴塘和阿墩子,经过拉萨到印度,吉尔认为此路或许尚无人穿越,且最为近便^{[5]144-145}。其行李分成40份,用了40个苦力来背。从成都到打箭炉,吉尔总共用了60个苦力,包括抬滑竿的、背行李的和佣人,议定到打箭炉每人3两2钱银子。他们于7月10日(据丁宝楨奏报,时间为阴历五月三十日)从成都出发,经双流、名山、雅州(雅安)、清溪、汉源、飞越岭、化林坪,于23日到泸定桥,再溯大渡河经小烹坝、瓦斯沟,顺炉河(折多河)而上至打箭炉^④。在此补充各种必需品(仅牛肉即达100磅)后,大队人马^⑤翻越折多山^⑥,经河口、理塘,于1877年8月25日到达巴塘。

与九年前库柏的计划一样,吉尔原拟从巴塘向西深入藏区腹地。对于其企图,清廷官方颇为清楚并严加防范。川督丁宝楨奏称其“明为查看通商事宜,乃遍地游历”,实则在于“查看道路形势,探明风土人情,以为后日拟由该国陆路出入川境”,并认为“英人通藏,必由此道”^{[9]15-18}。吉尔也记载说,毫无疑问,喇嘛们非常强烈地反对他们进入藏区。相关的谣言铺天盖地,说喇嘛们已经决定抵挡企图进入藏区的俄国人和英国人。巴塘粮台赵光燮和军官都明白无误地反对他们入藏的任何企图。赵说如果吉

尔执意要去,他可以尽力帮助,但那肯定会引起武力冲突。如果坚持入藏,那将不得不边打边走。为安全着想,他极力建议吉尔南下阿墩子,而不是取道拉萨。他不但会亲自陪同,而且要求土司随行,并且派大批卫队护送。他会派出6个密探,严密监视并汇报吉尔每时每刻的动向,并解释说,如果不是因为一些严重的因素,他是不会把自己卷入这一麻烦的旅程中的^{[5]222-223}。

因入藏受阻,在巴塘委员赵光燮的饬令及“蟒里、宗俄两协傲各带土司头目蛮兵随同护送”之下,吉尔只好折而南下,经宁静山进入云南,前往英属缅甸。1877年8月29日,吉尔一行从巴塘出发,土司本人与赵粮台带着卫队随行。吉尔记载说:“骡子、骡夫、土司与赵粮台、藏汉士兵、苦力、我们的随从,我们的队伍更像是一只军队而非私人旅行队。”^{[5]225}次日,在竹巴笼附近渡过金沙江,护卫队伍人数已经接近200人。8月31日,所有官员都骑马佩剑带火绳枪,因为“对面山上,约300名藏人如临大敌,严防我们走上进入拉萨之路。一看见我们,他们就鸣枪示警,尽管赵已经送信去说我们只是取道此地去阿墩子而已。直到安全走过藏人的阵地后,赵还带着约200名士兵尾随保护我们前行”^⑥。赵本打算和土司送吉尔一行到澜沧江和金沙江的分水岭,但他担心直接听命于藏王的阿墩子喇嘛对外国人十分敌视,为免遇到麻烦,他一直把吉尔一行送拢阿墩子^{[5]230-232}。此后吉尔翻越白马雪山到达东竹林寺,又翻越格里垭口,顺支巴洛(金沙江支流)而下到达金沙江边,顺江而下经巨甸到石鼓,再经剑川^⑦、大理到达八莫,探明了从四川穿越康区到云南和缅甸的连续路径。沿途吉尔对康区地理、气候、风土人情记载尤详,对大理以北丽江等地的纳西族和栗粟族的情况亦有记载。大理以南的路程不再“新鲜”,因为贝得禄与格罗斯温勒探险队同行调查“马嘉里事件”时已经探查过。

吉尔在康区开展的各种考察活动,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不断丰富和完善了人们对康区的认识,初步揭开了近代国际康区研究的序幕,也掀起了近代外国人涌入康区的热潮。此后,外国人入康人数猛增^⑧。

三 威廉·吉尔的代表作《金沙江》

(一)版本及主要内容

吉尔认为,三峡以上(至少从重庆开始),上至巴塘,就是著名的金沙江,因为他在重庆以下、三峡以

上就看见有人在淘沙金^{[5]80}。这与今天国内地理学界以宜宾以上为金沙江的地理划分不一样。与其书名关注的重点一致,吉尔《金沙江》一书,详于川西和康区。

1880年版《金沙江》分两卷:第一卷由导论(写成于1879年,亨利·玉尔上校和贝得禄编辑修改,篇幅80页)、正文九章(篇幅420页)及八幅中国分幅地图构成;第二卷由正文九章(篇幅411页)、附录“吉尔旅程表”(详列每日所经各地地名、海拔、里程)和索引构成。第一卷各章标题分别为:第一章远涉重洋,第二章长城,第三章北中国纵横,第四章环视中国,第五章由海溯江,第六章三峡,第七章重庆到成都府,第八章改道环行川北阿尔卑斯山区:成都到松潘厅,第九章成都及入藏之路。第二卷各章标题分别为:第一章富贵之城,第二章藏边的古典式远征,第三章打箭炉,第四章壮丽的高原1.打箭炉到理塘,第五章壮丽的高原2.理塘到巴塘,第六章金沙江地区1.巴塘到沙鲁,第七章金沙江地区2.沙鲁到大理府,第八章循着马可·波罗和马嘉理的足迹前行1.“金齿之邦”,第九章循着马可·波罗和马嘉理的足迹前行2.进入缅甸王国。

1883年再版本《金沙江》,在1880年版的基础上校正了不少错误,且内容更为丰富。如再版本增加了贝得禄和亨利·玉尔根据吉尔发表于1882年12月《皇家工程师杂志》(*Royal Engineers' Journal*,一种在皇家工程师公司中私下发行的读物)的随笔和日记摘录整理成的“吉尔传略”。再版本由前言(亨利·玉尔作,3-4页),目录(5-13页),插图目录(15-16页,共有插图和图片34张),吉尔传略(19-66页),地理学导论(67-141页),正文十五章(1-318页),正文后附索引(319-332页)及一张绘制得十分详尽的中国和东亚地图(333页,图中标有吉尔在中国的游历线路)构成。吉尔的姐姐希望再版时不省略“地理学导论”部分,撰写前言的亨利·玉尔上校作了适当修改。书中的插图主要来自吉尔考察途中所绘草图,少数增加的插图系1879-1880年塞切尼探险队的克瑞特纳中尉所绘。

再版本由贝得禄缩写,他曾与吉尔同行,溯扬子江入川。再版本正文共十五章,标题分别为:第一章不远万里去中国,第二章京城,第三章环视中国,第四章由海溯江,第五章三峡,第六章重庆到成都府,第七章改道环行川北阿尔卑斯山区:成都到松潘厅,

第八章成都及入藏之路,第九章打箭炉,第十章壮丽的高原 1. 打箭炉到理塘,第十一章壮丽的高原 2. 理塘到巴塘,第十二章金沙江地区 1. 巴塘到沙鲁,第十三章金沙江地区 2. 沙鲁到大理府,第十四章循着马可·波罗和马嘉理的足迹前行 1. “金齿之邦”,第十五章循着马可·波罗和马嘉理的足迹前行 2. 进入缅甸王国。比较二者篇幅,再版本大致压缩了 5 万字。

《金沙江》一书,内容详于康藏地区。举凡康藏地理与交通,中国中央政府在康藏地区的权力行使,对外国人的管理、防范和护送,康藏各级各族地方官吏及其相互关系,康藏地区的乌拉制、宗教、物产、物价、经济(尤其是边茶贸易),松潘的大集市(交易大会)、生活和风俗习惯、地方病,1871 年巴塘大地震情况,外国人眼中的汉藏、康藏关系,中外人士的“对视”和交往^[9],英国在康藏地区的战略企图等等,莫不详加记载。该书史料异常丰富,具有独特价值,可在很大程度上“扩充”相关史料,完全可称之为关于近代前期康藏地区的“百科全书”,其对研究近代中国尤其是康藏地区的政治、经济、人文、地理状况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该书之人名、地名和专有名词异常丰富、复杂,对当时外国传教士如肖沃和德什各丁斯等在康藏地区的活动以及中外、汉藏、康藏关系有多方面记载,准确地保存了大量涉及中外多方关系的珍贵史料。如该书“地理学导论”部分记载,尼泊尔格·巴哈杜尔大邦(Maharaja Jung Bahadur)使节卡吉·嘉提·希尔(Kaji Jagat Sher)经由巴塘、成都到北京朝觐并返回,他在巴塘与德什各丁斯有交往及情报交流,1867 年库柏在成都和巴塘遇见过他,库柏说尼泊尔使节受到汉人的待遇“很不好”,他们不许他越出成都一步^{[5]98-99}。不管库柏的记载是否具有主观偏见性,但核对库柏《穿越中国到印度的旅行》一书相关内容^{[1]158,398},可以看出,吉尔的记载是十分准确且忠实于原著的。此外,对比四川总督丁宝桢关于吉尔入康活动的奏报,尤其是关于川、康地方军政当局对吉尔入康之旅沿途的保护行动^{[9]15-18},我们认为,吉尔书中的记载是比较准确的,并不像近代许多入康外国人那样,对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进行肆意诋毁和污蔑。

(二)成就与局限

《金沙江》一书对康藏地区宗教和政权关系的记载与评述,尤其在对喇嘛制度的评价方面,虽带有主

观偏见,但其观察与分析却颇为深入。吉尔记载说,喇嘛在藏语中意味“上等人”,藏区喇嘛寺之多令人吃惊。打箭炉有 3 座,理塘城仅 1000 户人,却有两座喇嘛寺,共有 6000 名喇嘛。巴塘仅 300 户,却有 1300 名喇嘛,巴塘喇嘛寺的金顶花费超过 3000 两银子。旅行者也许整天只能看见少数几处村落,每村不过 10 来户人,却能到处听说附近有很大的喇嘛寺。喇嘛及喇嘛寺如此多的原因:一是父母将(多余的)儿子送进去以减轻负担,二是躲债者入寺免债,三是欠喇嘛寺债务者被抓进去成为喇嘛。喇嘛教和喇嘛寺很富有,其财富与日俱增,主要来自捐赠(人们死后常将财产和土地赠给附近的喇嘛寺)和高利贷,尤其是后者。喇嘛们并非整天从事宗教事宜,他们过的是一种十分自由的生活,他们享有免税特权,也不承担公共义务如乌拉。巴塘由其土司管辖,土司则听命于其上的直接统治者——一名汉官。税收通过土司进行,他将国税交给汉官,汉官则将其上交北京。巴塘赵粮台的前任是一个粗心又懒散的人,他自己乱花钱,而且听任土司挥霍,好几年不向四川政府上交国税,由于上面突然要求他完清所有欠税,他无从措手,只有丢官罢职,由赵氏继任粮台。赵担心上面要求赔补前任的亏空,拒绝到任,直到上面明确同意他只负责他本人任内应缴的税收才上任。除国税外,还有各村都得向土司缴税,这一制度确立于百年前,税额根据每村的住户数确定。从此以后,本地人口逐渐减少了 50%—60%,而且还在减少,税负变得越来越重,几乎难以承受,人们纷纷远走他方以躲避重税。农奴制是藏区的主要制度。富户拥有的农奴可达 500—600 人,他们子孙为奴,处境悲惨。一个农奴主家庭常用其农奴数和牲畜数来计算其财富。更准确地说,在藏区,更主要的是以农奴数为主来计算财富。如果有 300—400 头牲畜可算富有,那么仅有 20—30 头则只能叫穷人。尽管农民以马和骡的数量来统计其财富,而不是土地数,因为没那么多土地可占,但农奴数量可表示其能用于从事贸易、畜牧以及运输的劳力多寡,因此农奴数量就成了衡量家庭财富的尺度。藏区人口逐年减少,空置和荒废的村落随处可见。德什各丁斯对吉尔说,即使在他居住此地的短短一个时期,人口减少的数量也是十分巨大的^{[5]218-222}。尽管吉尔如此热衷于关注和

的政治和殖民战略寻找根据和造势,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其分析是颇为深入的。

受英国殖民政策的影响,吉尔在《金沙江》一书中的不少地方也显示出误解和偏见,如敌视中国中央政府和官方,视汉人(汉人政权和汉官)为敌视、排斥和反对外国人入康藏的政策和措施的始作俑者,书中不少地方透露出其认为汉人向华西和康藏地区扩张地盘和势力并压迫当地少数民族的偏见,等等。另外,由于对康区地理知识的了解还不够深入和完整,书中也存在一些错误。在该书“地理学导论”部分之前的四川和康区城市与河流地理图上,从重庆到雅鲁藏布江之间的主要城市与河流水系及走向基本清楚,但亦有错误:(1)无大渡河之任何名称,仅标出打箭炉至嘉定之间有一小河流,实际上大渡河并未经过打箭炉城;(2)无安宁河,仅会理附近标有短短一条极小河流;(3)雅砻江与安宁河、木里河、水洛河的水系有混淆,雅砻江的两个大转折未标示,显然当时康南和“独立保寨”地区(今凉山彝区)为地理学界的“认知空白”地带;(4)长江在石鼓和丽江附近的两个大转折虽有标示,但误差很明显;(5)伊洛瓦底江的上游河道用问号,表示有疑问;(6)察隅河上游和雅鲁藏布江大拐弯部分均用虚线标示,因为当时尚不清楚其具体情况,亦为地理空白地带。对于雅鲁藏布江水系问题,即西巴霞曲(Subanshiri)、丹红曲(Dihong,雅鲁藏布江干流)、丹巴曲(Dibong)、鲁西特河(Lohit,即察隅河)水系的源流主次关系,当时西方学术界并不清楚。故吉尔《金沙江》1883年再版本也认为鲁西特河乃“真正的雅鲁藏布江”(True Brahmaputra),而丹红曲(雅鲁藏布江干流)则是鲁西特河的支流^{[5]69-76}。

《金沙江》一书乃近代外国人入康藏地区活动著述的代表作之一,亦为近代西方学者最早从学术史的角度论述外国人到康区活动的著作。如该书“地理学导论”部分(最初写成于1879年),用了75页的篇幅论述此前外国人如法国人古伯察、秦噶哗、克里克(Nicolas Mickel Krick,又译“噶列克”)、蒲利(T. Boury)、杜多明(Thomine-Desmazures, Tacques Jean,又译“苏罗”)、杜朗(Durand, Pierre-Marie-Gabriol,又译“吕项”),英印间谍班智达南·辛格,英国人库柏、康慕伦,奥地利人劳策(Herr Ludwig V. Loczy,又译“罗兹”)及匈牙利人塞切尼·贝拉伯爵等在康区尤其是横断山区的地理考察和游历活

动,当然其主要是从地理线路勘察和地质学的角度进行学术回顾,指出其成就和局限。“地理学导论”部分还论述了下述史实:(1)当时西方地理学界已经注意到中国横断山区数条大山脉夹着数条大江并流之独特地貌^{[5]69};(2)法国传教士杜多明的信中提供的信息是当时西方学者了解澜沧江和怒江平行并流情况的最早和最主要来源^{[5]76-77};(3)吉尔之前,西方人关于金沙江的情况并不确知,之后仍有大量知识在不断更新、修正之中;(4)安邨(Garnier Marie Joseph Francois)对雅砻江与金沙江汇流处地理情况的实地考察记载;(5)岷江为长江支流,但传统中国人及其著述如《禹贡》(Yu-Kung)则视其为正源;(6)吉尔是第一个(1877年5-6月)从成都溯岷江而上探查岷山和川西北地区的人,其书中有专章(第七章)记载此行^{[5]102-139};(7)塞切尼·贝拉伯爵探险队的主要经历:该探险队包括地质学家劳策、测量员克瑞特纳中尉、语言学家巴材特(Herr Gabriel Balint)于1878年4月12日到上海,经日本到北京,然后溯长江经汉口到西安,1879年到兰州府,欲经甘肃肃州入藏,未获准,返回兰州府(曾到西宁府,欲到科科洛地区亦未成功),中国官方和当地喇嘛界仅同意他们经四川入藏,探险队从兰州南下,经甘肃南部、茂州、松潘厅到成都,1879年10月12日从成都出发到巴塘,欲入藏,未获准,沿金沙江东岸(吉尔走西岸)经丽江府到大理府,1880年2月13日到达八莫^{[5]137-140}。这些史料,对于我们研究近代外国人在康藏地区的活动,无疑具有重要价值。

吉尔在《金沙江》一书中,还考查和订正了古伯察《鞑靼西藏旅行记》中的一些错误,如古伯察认为“理塘”乃“盛产铜的平原”之意,但吉尔说他并未听见这一说法,言下之意,古氏之说并无根据^{[5]206}。古伯察又说巴塘是“盛产牛的平原”之意,吉尔认为这是误解;吉尔认为“巴”(Ba)并无特定含义,“塘”(Tang)在汉语里可指任何地方,“巴塘”大意为“温暖富饶”之地;巴塘靠近河流,气候温和,海拔8540英尺,平原2-3英里长、1-2英里宽,这里周围是山,少树木,无玉米、薯类和麦类;1871年巴塘地震前多酒,此后则少产酒^{[5]216-217}。

《金沙江》之内容后来为外国学者多次引证,在吉尔之后入康藏的许多西方人及其著述都以《金沙江》一书为圭臬,晚清和民国时期曾入康藏的许多西方学者如戴维斯(Henry Rudolph Davies)、金敦·

沃德^①、J·W·格利哥利和C·J·格利哥利^②、赫伯特·斯蒂文斯^③等都曾在其著述中参考引用了该书。由于目前国内尚未见中译本,故其中大量内容及重要观点不为人们了解。例如,国内学术界一般认为最早发现“三江并流”者为1911年后进入康区的金敦·沃德^[10-11]。但实际上,吉尔于1877年的康区之行已经注意到了“三江并流”这一重大地理奇观,并在《金沙江》中有记载:“金沙江、澜沧江和怒江,在相当狭窄的范围内,被高大的山脉隔开,紧挨着由北向南平行奔流。在这里,三条河具有相同的地理特征:他们就像地质时期大自然的若干次暴力

抽搦劈裂了地表从而形成的几条大裂缝。”^{[5]235}此后,关于横断山区数江并流的现象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好奇,著名的英国人立德(Archibald John Little)在其《远东》(*The Far East*)一书中,记载了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四江并流”的情况^{[12]214}。为吉尔作传的英国人亨利·玉尔上校认为,吉尔关于康区的许多记载,后来都成为了皇家地理学会引述的蓝本。近代地理学界泰斗李希霍芬亦对吉尔的“川北之旅,以及打箭炉至阿墩子之间的旅行线路”及该书“对人与自然的准确观察和精确测绘记载”给予了高度评价^{[5]30}。

(本文写作过程中,承蒙杨天宏教授和汪洪亮副教授多次提出修改意见,文章发表前又承蒙审稿人不吝指正,特此致谢!)

注释:

- ① 贝得禄(Edward Colborne Baber, 1843—1890, 又译“巴伯”), 英国首任“驻寓”重庆商务代表, 马嘉理事件后曾参与“滇案”观审。1877年同吉尔一同入川, 后以考察商务为名, 游历四川, 经成都、嘉定、峨边、越嶲、宁远、会理入云南, 转泸州、合江等地返重庆, 沿途收集和制作了大量资料、地图。贝得禄经清溪县到过打箭炉, 并著有《打箭炉之行报告》(Report by Mr. Baber of his journey to Ta-Chien-Lu) 和《华西旅行考察记》(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Western China), 1883年曾获英国皇家地理学会金质奖章。贝氏为吉尔《金沙江》一书再版进行了缩写和编校工作。
- ② 《阿坝州志》(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 下册第2495页) 记载“英国上尉及尔”1878年从茂县、黑水, “又经马尔康地区再往甘孜地区, 然后经缅甸返英”。误。
- ③ 1852—1853年, 法国传教士罗启祯(Reuno, Charles Rene Alexis, 1812—1863, 又译“罗勒拏”、“罗勒拿”、“勒努”) 为了入藏, 曾在此寺伪装学佛近一年。
- ④ 据吉尔记载, 沙鲁(Sha-Lu) 村距东竹林寺25英里。
- ⑤ William Gill. *The River of Golden Sand: being the narrative of a journey through China and Eastern Tibet to Burma*. London: John Murray, 1880. 该书1883年再版。下文若非特别注明, 均引用该书再版本(简称“《金沙江》再版本”)。
- ⑥ 徐尔灏《青康藏新西人考察史略》, 国立中央大学研究院理科研究所地理学部1945年版; 房建昌《西藏基督教史》(上、下), 《西藏研究》1990年第1—2期; 杜永彬《康巴文化在国外的传播和影响——以国外康巴研究为例》, 载泽波、格勒主编《横断山民族文化走廊: 康巴文化名人论坛文集》, 中国藏学出版社2004年版; 泽拥、旦增遵珠《从入藏路线的书写看19世纪法国对中国藏族地区的殖民想象——以法国人旅藏游记为中心》, 《西藏研究》2007年第1期; 冯明珠《近代中英西藏交涉与川藏边情——从廓尔喀之役到华盛顿会议》, 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1996年版; 王川《西藏昌都近代社会研究》, 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赵艾东《1846—1919年西方人在康区的活动研究》, 四川大学2010年博士学位论文。
- ⑦ 奥古斯特·德什各丁斯(Auguste Desgodins, 1826—1913, 又译“德格定”), 1855年来华, 在康区传教58年。关于西藏语言地理的著作甚多, 编有《藏法字典》一书, 死于大吉岭。吉尔在巴塘得到了德什各丁斯提供的物质生活用品和信息资料情报等多方面帮助。
- ⑧ 李希霍芬在其书第一卷《中国》中记载那曲卡(Nak-chu-ka), 藏名 Nam-chu, 意为“天河”(Sky Water)。李希霍芬亦错误地认为其系怒江上游。笔者查阅相关文献记载, 发现上述诸人所讨论之那曲卡即独龙江, 系恩梅开江上游。其水系图可参见前文所述 W. J. Turner 所绘地图“Route Map of Captain W. J. Gill's Journey in Western China and Eastern Tibet”。
- ⑨ 吉尔在此记载说雅砻江在四川嘉定府(即乐山) 汇入扬子江, 系混淆了雅砻江与大渡河。
- ⑩ 亨利·玉尔(Henry Yule, 1820—1889), 英国地理学家和东方学专家, 1820年5月1日生于苏格兰的中洛锡安, 1840年在印度加入孟加拉工程师协会, 参加了蒙哥尔灌溉系统的重建工程, 1845—1846、1848—1849年参加了锡克教教徒战争, 1855—1862年在印度公共建筑工程部门任职, 1875年回英国后在印度理事会任职, 1889年被封为爵士, 同年12月30日病逝于伦

敦。有《马可·波罗游记导言》、《柯罗洪从广东到缅甸之旅》等著述。

- ⑪约瑟夫·皮埃尔·肖沃(Chauveau, Joseph Pierre, 1816—1877, 又译“丁盛荣”、“丁德安”, 汉名“丁硕卧”), 法国传教士, 1844年来华, 在云南传教, 1850年7月6日升任云南教区副主教, 负责滇中、滇西教务, 1860年到德钦, 1864年任罗马教皇驻西藏代表(西藏教区主教), 同年2月离滇抵打箭炉赴任, 任打箭炉天主教司铎, 1877客死于打箭炉。肖沃在中国生活了32年。1868年库柏在打箭炉曾得到肖沃多方帮助。1877年吉尔在打箭炉时, 肖沃用自制的酥油殷勤接待他, 并设法帮助他解决了好些难题。吉尔记载说肖沃一直想将西方宗教传入拉萨, 但他已步入暮年, 已等得太久, 而希望仍然很渺茫。详参《金沙江》1883年再版本, 第184-186页。
- ⑫麦士尼(Mesny, William, 1842—1919, 清官方文档译为“麦士尼为能”——姓“麦士尼”, 名“为能”, 身份为“英商”), 1859年到上海, 1861年11月在从汉口至上海途中曾被太平军拘留数月, 1862年由英国公使威妥玛亲乘英舰至南京救出。曾在汉口海关任职。1870年后到贵州, 因修制并教导军队使用“开花大炮”有功, 且肯“改遵中华服色”, 被保奏授“参将”衔, 赏戴花翎, 随后被保举“以参将补用, 并加副将衔”, 后投入左宗棠部, 获名誉提督衔和巴图鲁称号。麦氏几乎走遍中国内地各省, 除陪同吉尔穿越康区外, 1879—1881年间, 麦氏还在华西南等地收集过75种植物, 包括10个新种。麦氏著有《北圻》(*Tung King*, 1884)一书和《藏区的淘金业》(*Gold-Washing in Tibet*)一文, 并在《亚洲文会学报》发表过《云南的资源和贸易路线》等文。1895年后在上海主编《华英会通》, 1919年死于汉口。
- ⑬吉尔对打箭炉各方面情况及当地人反对其入藏有专章记述, 详见《金沙江》1883年再版本第九章。
- ⑭共17人, 包括8个滑竿苦力, 4匹马及29头驮行李的动物, 以及跟随的护送卫队。
- ⑮在《金沙江》一书中, 吉尔多次对康区壮丽的景色发出由衷赞叹。翻越折多山后, 吉尔写到, 脚下是一道美丽的山谷, 伸向远方, 平缓的圆顶山峰, 绿草丰茂, 成千上万头牦牛和羊在悠闲地吃草, 野花遍地, 空气中充满了花香; 高原风云变幻, 景色如梦如幻。绿草如茵, 空气奇香, 人们忍不住激动得在原野上狂奔, 麦士尼的跟班也受到感染, 随后飞跑, 人们高兴得几乎发了狂。“感受到终极快乐, 忘却了一切尘凡”的吉尔, 说他简直想在这美得无以复加的山谷中终其余生。详见《金沙江》1883再版本, 第194-199页。
- ⑯吉尔在巴塘受到藏人鸣枪阻拦以防入藏一事, 可谓正中欲利用藏人阻挡外人入藏的川督丁宝楨下怀。此后丁氏长期采取这一策略, 以阻止外国人进入巴塘以西的康藏地区, 从而对近代中英关系及汉藏、康藏关系产生了多方面影响。详参冯明珠《近代中英西藏交涉与川藏边情——从廓尔喀之役到华盛顿会议》, 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1996年版, 第121-124页。
- ⑰详《金沙江》1880年版, 第二卷第七章。《金沙江》1883年再版本第十三章对吉尔从东竹林寺到剑川的经过及内容仅几句带过, 笔者以为其缩写欠妥。
- ⑱据笔者统计, 1846—1875年进入康区的外国人为31人, 而1876—1911年则达304人。
- ⑲吉尔记载说, 他在去松潘途中喜欢上了四川苦力们抽的烟斗, 某天从一个四川苦力处借了一个, 此后就再也没有用过优雅但旅途中甚觉麻烦的水烟筒。到达巴塘后, 他与苦力们互赠礼物, 苦力们回赠吉尔一坛黑麦酒; 滑竿苦力最后一致商定继续送吉尔直到云南, 就像大家是同路人一样; 马夫们想回家, 吉尔很舍不得, 因为他们都是优秀的服务员, 临别前大家都处于依依惜别的状态, 开始唱歌、聚饮、互赠礼物。详参《金沙江》1883年再版本, 第126、216-217页。
- ⑳吉尔和戴维斯都曾翻越过白马雪山, 金敦·沃德通过实测并比较吉尔的记载, 发现戴维斯的地图不准确, 白马雪山山口小河流的方向画反了。详参(英)金敦·沃德著《神秘的滇藏河流》, 李金希、尤永弘译, 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 第17页。
- ㉑(英)J·W·格利哥利(J. W. Gregory)和C·J·格利哥利(C. J. Gregory)在《迈向汉藏边的阿尔卑斯山区: 藏边雪域探险之旅往返记》一书中多处引用了《金沙江》资料, 详J. W. Gregory & C. J. Gregory. *To the Alps of Chinese Tibet: An account of a journey of exploration up to and among the snow-clad mountains of the Tibetan frontier*. London: Sseeley, Service & Co. Limited, 1923. pp. 84, 219, 221, 235.
- ㉒1929年, 赫伯特·斯蒂文斯在打箭炉停留期间, 曾与叶长青一道经雅加阁到贡嘎山考察, 并在其书中引用了吉尔关于贡嘎山的考察资料。详参(英)赫伯特·斯蒂文斯著《经深峡幽谷走进康藏: 一个自然科学家经伊洛瓦底江到扬子江的游历》, 章汝雯、曹霞译, 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 第146页。

参考文献:

- [1] T. T. Cooper. *Travels of a Pioneer of Commerce in Pigtail and Petticoats* [M]. London: John Murray, 1871.
- [2] Edward Colborne Baber. *A Journey of Exploration in Western Ssu-Ch'uan (1882)* [M] // Edited by Elizabeth H. Chang. *British Travel Writing from China, 1798—1901, Volume 4*.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10.
- [3] Edward Colborne Baber. *Report by Mr. Baber of His Journey to Ta-Chien-Lu* [J]. *China*, No. 2, pp. 1-2. London: Printed

by Harrison and Sons, 1879.

[4]刘吉西,等. 四川基督教[M]. 成都:巴蜀书社,1992.

[5]William Gill. *The River of Golden Sand: being the narrative of a journey through China and Eastern Tibet to Burma* [M]. London: John Murray, 1883.

[6]William Gill. Travels in Western China and on the Eastern Borders of Tibet[J]. *Journal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London*, 1878, Vol. 48, pp. 57-172.

[7]William Gill. Travels in Western China and on the Eastern Borders of Tibet[J].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London*, 1877-1878, Vol. 22, No. 4, pp. 255-271.

[8]William Gill & Charles E. D. Black. The Upper Salwen, or Lu-tze-Kiang River.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and Monthly Record of Geography[J]. *New Monthly Series*, Vol. 5, No. 11(Nov., 1883), pp. 664-667.

[9]丁彦楨. 英人吉为哩等由川赴藏番夷阻回片[G]. 英人入藏探路用意狡谲请密飭驻藏大臣修好于布鲁克巴以固藩篱片[G]//王彦威,王亮. 清季外交史料:卷十二.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

[10]章铭陶. 他发现了三江并流[J]. 中国国家地理,2004,(7):103.

[11]司空小月. 他并没有因为发现三江并流而声名鹊起[J]. 中国国家地理,2009,(10):70-73.

[12]Archibald John Little. *The Far East*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An Inquiry into the Expeditions through the Khams of William John Gill and Gill's Masterpiece *The River of Golden Sand*

XIANG Yu-cheng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4;

Sichuan Tourism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Leshan Normal University, Leshan, Sichuan 614000, China)

Abstract: William John Gill was the first proactive westerner to have crossed through the modern Khams, capturing the unique understanding on the Khams with multi-aspect achievements made in the expeditions, and officially undraped the prelude to international Khams studies, rendering significant impact on modern western academia. Gill's masterpiece, *The River of Golden Sand*, is the first academic work on westerner in the Kha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cademic history. Despite of some limitations, it plays, with its abundant historical data, the role of an encyclopedic reference for the contemporary study into the foreigner's exploration in the Khams.

Key words: William John Gill; the first proactive one to make expeditions through the Khams; *The River of Golden Sand*

[责任编辑:凌兴珍]